

近现代《论语》注本比较研究：以杨树达《论语疏证》与钱穆《论语新解》为中心

焦晓梅，赵瑞松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4日

摘 要

本文以杨树达《论语疏证》与钱穆《论语新解》为中心，比较二者在学术背景、编撰缘起、解读方法及语言风格上的差异。研究表明，杨树达深受乾嘉朴学与近代实证思潮影响，以“以史证经”为核心，构建严密的史料互证体系，语言客观克制，重在考据之“真”。钱穆则以“温情与敬意”为治学的情感基调，以“直明本义”与“折衷求是”为宗旨，语言平易近人，侧重义理的现代阐释与经世致用，重在义理之“用”。二者共同体现了近现代学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同的治学取向与对文化遗产的关切，对当代经典诠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近现代，杨树达，《论语疏证》，钱穆，《论语新解》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nalects* Commentaries: Centering on Yang Shuda's *Analects Subcommentary* and Qian Mu'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Xiaomei Jiao, Ruisong Zh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21,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文章引用: 焦晓梅, 赵瑞松. 近现代《论语》注本比较研究：以杨树达《论语疏证》与钱穆《论语新解》为中心[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4): 1045-1053. DOI: 10.12677/isl.2026.104123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ang Shuda's *Analects Subcommentary (Lunyu Shuzheng)* and Qian Mu'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Lunyu Xinjie)*, focusing on their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background, editorial origins, interpretive methods, and linguistic style. The study shows that Yang Shuda,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Qian-Jia school of Evidential Learning and modern empirical thought, adopts a "verifying the classics through history" approach, constructing a rigorous system of cross-referenced historical sources. His language is objective and restrained, emphasizing the "truth" of textual verification. In contrast, Qian Mu, on the other hand, adopted "warmth and reverence" as the affective foundation of his academic work, pursues the goals of "clarify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directly" and "seeking truth through synthesis". His language is accessible and plain, focusing on the modern reinterpretation of core Confucian principles and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by emphasizing the "utility" of moral teachings. Together, these two works exemplify the distinct scholarly orientations and shared concern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ssumed by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context of East-West cultural interaction, offering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Yang Shuda, *Analects Subcommentary (Lunyu Shuzheng)*, Qian Mu,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Lunyu Xinji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论语》作为儒家核心经典,自汉代以来注家蜂起,形成了浩如烟海的注释传统。进入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与学术转型,传统的经学诠释面临着科学化与现代化的挑战。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杨树达的《论语疏证》与钱穆的《论语新解》如同双峰并峙,代表了20世纪《论语》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

杨树达身处新旧交替之际,试图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著作是对传统朴学的总结与超越;钱穆则力图通过阐释经典来重新肯认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二者虽同治《论语》,但因学术渊源、治学目的及面对的时代课题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学术风貌。本文将从编撰背景、考证与阐释方法、语言风格及传播影响等维度,对这两部经典注本进行深入比较,以期揭示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复杂图景及其对当代经典诠释的启示。

2. 杨树达与钱穆的学术背景及两部注本的编撰缘起

(一) 杨树达的学术背景与《论语疏证》的编撰

杨树达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教师世家,五岁起承庭训,其父精熟《史记》《资治通鉴》,以史学为核心的早期教育为其日后治学埋下根基。1897年,他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研习《孟子》《公羊传》;后受业于文字版本学家叶德辉,系统学习《说文解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经历使其兼具晚清湘学“兼采汉宋、经世致用”的学风与乾嘉朴学的扎实功底。

1905年,杨树达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宏文学院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攻读外国语言学。这一跨文化背景使他跳出了传统经学的窠臼,开始自觉地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小学研究。归国后,他致

力于将现代语法学与传统训诂学相结合,在语法学、修辞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

《论语疏证》的撰著,经历了长期的学术积累。该书脱胎于1933年所撰《论语古义》,1942年他在抱病之际扩充材料,历时九十日初成,以石印本作为讲义分发学生并求教正。此后先生随时增益考订,最终定稿较之初稿扩充逾半。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确立了其经典地位。杨树达在自序中标举“疏通孔子学说”的宗旨,并在方法论上打破传统注疏窠臼,确立了“或以经证经,或以史证经,或以子证经”^[2]的立体论证体系。陈寅恪在序言中赞誉此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

杨树达的治学路径,与“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顾颉刚等学者的具体实践既有呼应又有差异。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国故的工夫”,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顾颉刚则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冲击传统经学体系,致力于剥离后世附会以还原古史真相。杨树达与上述学者同样服膺科学实证精神,同样强调史料的价值,但其不同之处在于: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带有较强的“反传统”色彩,旨在以现代科学方法清算旧学;杨树达则更接近于章太炎一脉的“保存国粹”取向,其考证的目的不在解构经典权威,而在以更严密的证据体系重建经典的可靠性。陈寅恪在《论语疏证》序中称其“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正是指出杨树达的考证虽取径近代史科学,但其精神归宿仍是传统的经学守护——这与胡适派“整理国故”的批判性取向形成了微妙的分野。

(二) 钱穆的学术背景与《论语新解》的编撰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家道中落但恪守“读书须尽”的祖训。幼年受祖父手抄《五经》及父亲乡间践行儒家伦理的言传身教,使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认同。1904年入读新式果育学校,既受传统国学熏陶,又得接触新学。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史地教师吕思勉的影响,师生二人日后就经学今古文问题多次长函往返、切磋学问,这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学术砥砺极大地促进了钱穆的学术成长。

青年时期,钱穆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乡村中小学教师生涯。在此期间,他遍览传统古籍与西方人文社科译著,凭借扎实的自学功底,于1930年以《先秦诸子系年》等著作一鸣惊人,经顾颉刚等名家推荐,从中学讲台登上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的讲坛。

钱穆对《论语》的探索始于早年。1918年,受同学启发,他仿照《马氏文通》体例撰成首部著作《论语解》,以“起、承、转、合”标明《论语》句法。此后相继出版《论语要略》与《先秦诸子系年》,将文本解读与生平考据相结合。在《论语新解》^[3]中,他打破了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见,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反复劝勉读者在“吃紧为人”处研读《论语》。该书以“直明本义”为宗旨,采用浅近白话与典雅简洁相结合的语言,力求使“古今人相悦而解”。

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与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人物既相通又各有侧重。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意欲”的不同走向区分中、西、印三种文化,断言中国文化的复兴将是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其关怀在于文化类型的比较与抉择;熊十力则以“体用不二”的哲学体系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基础,其着力点在哲学理论的创构。钱穆与二人同样对传统文化怀有深切的认同,同样致力于回应西学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存续问题,但其进路有所不同:钱穆始终以史学家的身份从事经典阐释与文化叙述,他更注重从历史演变中揭示文化的连续性,而非像梁漱溟那样进行文化哲学的宏观比较,或像熊十力那样进行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建构。钱穆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提出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恰可与其《论语新解》的撰述相互发明——二者同为以历史叙述守护文化认同的学术实践。相较于梁、熊的哲学建构,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表现为一种“历史守护型”的民族文化立场。

(三) 两部注本的编撰目的与风格差异

受“以史证经”目的的驱动,《论语疏证》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则缺。这种风格不尚空谈,重实证而轻主观发挥,体现了近代科学精神对传统经学的改造,是一部具有高度方法论意义的学术专著。

为实现“通俗易诵”与“直明本义”的目的,钱穆刻意摆脱了繁称博引的旧格套,采用浅近白话与典雅简洁相结合的现代语言。在内容上,他不仅融会前人注疏,更融入了强烈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文化关怀,对孔子形象及儒家思想多有善意的释读与主观的维护。这种风格使《论语新解》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考据,成为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经典普及读物。

可见,《论语疏证》与《论语新解》在编撰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前者以“还原”为旨归,致力于通过史料互证逼近《论语》的历史本义;后者以“转化”为使命,致力于通过义理阐释激活《论语》的当代价值。一面向过去,一面向当下,共同构成了20世纪《论语》研究的两翼。

3. 《论语疏证》与《论语新解》的内容比较

(一) 对《论语》原文解读的异同

杨树达解读核心在于“证”。他主张“以史解经”[4],通过详尽的史料互证来还原经文的客观含义。其方法是“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力求在繁杂的文献中通过逻辑链条还原孔子言行的历史语境。例如在解读“夷狄之有君”时,他不仅罗列前人说法,更通过考证“之”字的语法功能及历史背景来判定文义,体现了极强的客观性与实证性。由于杨树达坚持“有证则存,无证则缺”的原则,其解读往往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同时引用的文献涵盖经、史、子三类。

钱穆则侧重于“解”,其目的在于“直明《论语》原文之本义”。他反对繁琐的征引和晦涩的格套,主张用现代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的遗训,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他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训诂考据,而是通过折衷众说、辨析义理来揭示《论语》的微言大义。例如在“夷狄之有君”一章中,他虽也辨析古今通义,但最终落脚点在于“道”高于“君”的政治哲学原则,语言明净,意旨通达。

又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章的解读,二者侧重点亦判然有别。杨树达广引《礼记·学记》《荀子·劝学》等文献,以“时习”为“时时温习”,重在从制度与实践中考证“学”的外在路径;钱穆则释“时习”为“时时体悟”,强调“学”是内心的自觉与生命的滋养,重在挖掘“悦”字所蕴含的心性体验。一重外在规范,一重内在心性,差异昭然。

(二) 观点阐释的异同

杨树达在阐释孔子思想时,表现出一种近于“价值中立”的学者态度。他虽推崇孔子,但并不盲目回护。例如在面对“民可使由之”这一历来有争议的命题时,他没有像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那样进行政治化的曲解或回护,而是基于教育普及的可能性,委婉地指出了孔子此言“似有轻视教育之病”[4]。同时,在论述中杨树达通过引用《史记》《左传》等史料,为《论语》中的言论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背景。例如在解释“使民以时”时,他不仅引用《礼记》说理,更引用《春秋》经传中的具体筑城事件来证明“时”的具体所指,使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钱穆则以对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为出发点,他将《论语》研究视为民族文化认同重建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在阐释时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他极力维护孔子形象的完满性,如在“无友不如己者”的解释中,他力排众议,坚持从“进德辅仁”的角度将此解为择胜己者为友,认为这是孔子直指人心的劝学之语,而非势利的交友观。而钱穆在论述中致力于打通古今隔阂。他不仅解释古义,更强调《论语》义理在现代的适用性(古今通义)。他认为《论语》中的“道”是跨越时空的,如在解释“君子不器”时,他联系近代科学分工过细的弊端,指出通才的重要性,赋予了古老命题以现代生命力。

(三) 侧重点的差异

《论语疏证》的重心在于“疏证”二字。杨树达将大量精力用于搜集先秦两汉的典籍,通过排比分类(如疏解之文、说明之文、说理之文),为《论语》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史料价值。他的按语虽少,但往往是在史料充分铺陈后的画龙点睛,重在通过客观材料让读者自行得出结论。

《论语新解》的重心在于“新解”。钱穆利用现代白话文的优势,将《论语》的章句翻译与注释融为一体。他特别注重挖掘《论语》中的文学美感与艺术价值,如对“逝者如斯夫”的解读,不仅阐释哲理,更品味其如散文诗般的意境。此外,钱穆强调“经世致用”,将孔门的“入世”精神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救世情怀相结合,使《论语》成为一部活的哲学指南。

4. 《论语疏证》与《论语新解》的方法比较

(一) 杨树达的训诂考证方法

杨树达自幼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熏陶,在《论语疏证》的撰写中,他始终秉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原则。他注重音韵、文字、训诂等小学功夫,强调引经据典与反复举证。在考证过程中,他不仅讲求义理的阐发,更坚持以故训为基础,力求通过扎实的传统小学功底来摇撼空疏的学风,确保每一个字词的训释都有坚实的文献支撑。

受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杨树达在《论语疏证》中践行了“证而不疏”“存而不补”的客观态度。他主张“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在考证时极力避免主观的过度推论。为了追求博洽与精密,他打破了单一文本的局限,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史料互证体系:不仅搜罗剔抉现存史料至“物无弃材”,还广泛运用“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子证经”的交叉验证法。此外,他还将视野拓展至金石考古材料乃至外国史料,通过多源材料的钩稽与整比,使《论语》的考证达到了有理有据、客观公正的科学高度。

杨树达虽然标举“无征不信”的客观原则,但其学术实践并非全然价值中立。他在《论语疏证》自序中明言撰述目的在于“疏通孔子学说”^[1],这一表述本身即隐含对孔子思想的正面肯定。更值得注意的是,杨树达在1942年炮火纷飞之际抱病撰著,其文化守护的意图不言自明。他在书中虽克制地“间下己意”,但所下之意往往指向对孔子思想的疏通与维护。例如在“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一章的按语中,他引《左传》史料后,以“此可见孔子称人之审”作结,语调中已隐含对孔子评价尺度之精当的赞许。这种在客观引证中透出的价值认同,恰是乾嘉学者“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传统的延续——考据本身即是对经典价值的守护。由此观之,杨树达的“客观”并非冷眼旁观的超然,而是以考据为路径的文化坚守,其考证之中自有义理的关切。

杨树达在《论语疏证》中的另一大创举,是创造性地将西方语法学与语源学引入传统训诂之中。他敏锐地指出“治国学必须通晓训诂,懂得文法”,二者相辅相成。在考证《论语》时,他不仅运用传统训诂,还借助西方语法体系对古汉语的词类与句法进行科学剖析,纠正了以往仅凭语感训释的局限。同时,受欧洲语源学启发,他确立了“因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5]的考证路径。他认识到形声字的声旁往往蕴含意义,从而在《论语》字词考证中,通过追溯语源来探求词义的演变与内在逻辑。

以《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中“温”字的考证为例,杨树达并未停留于传统训诂“温,寻也”的表面解释,而是运用语源学方法,指出“温”与“蕴”“韞”同源,皆有“蕴藏、积蓄”之义,从而将“温故”理解为“将所学知识蕴藏于心、反复体味”,而非简单的“温习”。这种因声求义的考证路径,既超越了传统注疏的局限,又为理解孔子“知新”之说提供了更为精微的语言学依据。

(二) 钱穆的义理阐释方法

钱穆在阐释《论语》义理时,首要原则是“直明《论语》本义”。面对历代注本有时为原典增添晦涩艰深的问题,他主张摒弃旧注格套,以直解、通义为要,避免曲折偏解。在方法上,他秉持“折衷求是”的态度,广辨精择前人注析,择取平实通常的注解,以揭示先秦时代《论语》的原貌。同时,他高度重视

“古今通义”，强调《论语》之义理能够跨越时空藩篱，在当代依然发挥效用。在行文上，他力求“体求简要，辞取明净”，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引导读者，既兼顾了《论语》简短精微的文辞之美，又确保了义理阐释的通俗易懂。

面对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质疑与批判，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贯彻了对经典内在价值的肯认。他拒绝偏激的虚无主义，在阐释涉及孔子思想的语句时，辅以深厚的民族情感与历史同情。他不仅将孔子视为高高在上的圣人，更将其还原为在特定历史时代中发挥光彩的凡人之躯。这种温和而充满敬意的解读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支撑力量，使读者能够真切体会到儒家思想的内在生命力。

在义理的发掘上，钱穆反对故作高深，主张从寻常之事与日常生活中提炼《论语》的道理。他深刻指出，孔子之教多直指人心，思想往往存在于最浅显处。基于此，他提出了“人道必本于人心”的纲领性命题，从“心学”的角度将“仁”视为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相通；同时从“史学”的视野出发，将“礼”视为“仁道”的最高体现。这种立足于平实浅近语言的阐释，不仅准确描述了孔子思想，也契合了儒家不尚空泛思辨、注重真修实践的特质。

钱穆在侧重于义理的疏通与阐发的同时，亦从未放弃对历史文献的严谨考辨。他虽然批评繁琐考据，但其《论语新解》中对前人注疏的折衷取舍，是建立在对皇侃《论语义疏》、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等数十家注本的系统比较之上。在涉及关键章句时，他往往先列诸家异说，再辨其短长，最后“折衷求是”——这正是史学考据的基本工夫。例如在“夷狄之有君”章，他先引皇侃、邢昺之疏，再辨朱熹注之得失，最终以“道高于君”的义理判断统摄全章。义理的阐发并未脱离文献的根基，只是其考据的目标不在字词的精确溯源，而在思想脉络的通贯把握。钱穆的“解”并非空悬的发挥，而是以文献的“证”为底色的义理重建。

(三) 两种方法的特点与优劣

杨树达的方法以“实证”与“科学”为核心特征。他融合了传统乾嘉朴学、近代史科学与西方文法语源学，构建了一套严密的考证体系，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他秉持“无征不信”“证而不疏”的原则，通过“以经证经、以史证经”^[4]及引入金石考古等多源史料互证，较大程度地排除了主观臆断，还原了先秦字词的本义。他引入西方语法与语源学，以“因声类以探语源”^[5]的路径，弥补了传统训诂仅凭语感和经验的不足，使《论语》研究具备了现代语言学的科学基础。

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陷入“琐碎”与“见木不见林”的困境。过度追求字词的精确考证与史料的穷尽，有时可能会割裂文本的整体连贯性，使读者迷失在繁复的考据之中。其二，对义理的发掘相对克制。由于极力避免主观推论，其在阐释《论语》深层思想与哲学意蕴时，往往显得较为保守，难以充分展现儒家思想的宏大格局。

钱穆的方法则以“通识”与“致用”为核心特征。他以直明本义、折衷求是为手段，旨在发掘《论语》的古今通义，具有突出的现实关怀与思想穿透力。他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现实人生相呼应，从寻常日用中提炼义理，使古老的经典重新焕发了指导现实人生的生命力。其次，兼顾了学术的通俗性与人文性。他摒弃了晦涩的旧注格套，语言平实浅近，且充满对孔子及传统文化的历史同情，较好地拉近了经典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但是，钱穆的方法同样面临挑战。其一，义理阐释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为了“直明本义”或服务于“经世致用”的现实目的，他在面对历代注本分歧时，其取舍标准往往依赖于个人的理论判断与义理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纯粹的客观性。其二，在字词训诂的精密程度上可能有所妥协。相较于杨树达严密的史料互证，钱穆更侧重于整体思想的融贯，有时为了成全义理的通达，可能会在个别字词的考据上做出让步。

5. 《论语疏证》与《论语新解》的语言风格比较

(一) 《论语疏证》的语言风格

受近代实证主义史科学的影响,杨树达在行文中极力避免主观的过度推论与空泛的义理阐发。其语言风格表现为高度的克制与客观,主张“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在论述过程中,他多以罗列和呈现史料为主,让证据本身说话,而非以华丽的辞藻或主观的情感去渲染,从而确保了文本的学术严谨性与客观公正性。

《论语疏证》在语言的组织与编排上,展现出较强的条理性与逻辑性。其行文次序严格遵循“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递进逻辑:大抵以训解字义、说明文句者居前,发明学说者次之,旁证之事例又次之,旁证推衍之文字复次之。

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上,该书大量采用“合本子注”的体例,将不同时期的文献并列对照。其文字不尚雕琢,以平实、简练的学术语言为主,但在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广博的文献底蕴。通过“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子证经”^[4]的交叉引证,其语言构建起了一张严密的证据网络,使整部著作呈现出一种厚重、扎实且具有说服力的文献质感。

(二) 《论语新解》的语言风格

为了打破历代注本有时过于晦涩艰深的弊端,钱穆在《论语新解》中确立了“体求简要,辞取明净”的语言基调。他有意摆脱旧注的繁琐格套,采用平实浅近、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来阐释孔子思想。这种循序渐进、不故作高深的表达方式,不仅兼顾了《论语》简短精微的文辞之美,也较好地拉近了经典与普通读者的距离,真正践行了其“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的初衷。

在追求通俗的同时,《论语新解》并未走向极度的白话化,而是保留了典雅的学术质感。钱穆在注解中采用了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既不失传统经学注疏的庄重与风雅,又融入了现代白话的流畅。这种语言选择不仅准确传达了孔子思想的深邃,还赋予了文本一种温和、从容的叙述语调,使读者在阅读时既能感受到学术的严谨,又能体会到儒家思想温润如玉的人文气息。

有别于纯粹客观冷峻的考据著作,《论语新解》的语言中蕴含着较强的现实关怀与深厚的情感。钱穆将“人道必本于人心”的命题与“经世致用”的使命感融入字里行间,在阐释中倾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切认同。这种情理交融的语言风格,使得《论语新解》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注解,成为了一部充满人文温度的思想之作,能够深切地触动读者的精神共鸣。

(三) 语言风格对注本传播与接受的影响

杨树达《论语疏证》秉持“证而不疏”的客观克制,其语言风格呈现出较高的学术规范性与逻辑严密性。这种广博平实、层层递进的文献质感,使其在学术接受上获得了较高的评价。陈寅恪赞誉其“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确立了其在近代《论语》研究中的标杆地位。然而,这种以实证和考据为核心的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提高了阅读门槛。它主要面向具备深厚文献学、文字学功底的专业学者,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繁复的引证与客观克制的叙述显得过于艰深。因此,在传播广度上,《论语疏证》主要局限于学术圈层,难以实现广泛的社会普及。

相较于《论语疏证》的冷峻客观,钱穆《论语新解》“辞取明净”、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有效降低了阅读门槛。其平实浅近、循序渐进的叙述方式,成功打破了传统经学注疏的壁垒,使其在传播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这种情理交融的语言风格,在带来广泛接受度的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为了追求通俗与义理的通达,其语言中夹杂的主观色彩与对儒家的美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纯粹的客观性。

因此,《论语疏证》以客观严谨的语言确立了学术的“深度”,在专业领域内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

但限制了大众传播;《论语新解》则以平易温润的语言拓展了文化的“广度”,在普及儒家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此承担了主观性的学术争议。

6. 《论语疏证》与《论语新解》的价值与影响

(一) 学术价值

杨树达先生作为一位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学者,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学术潮流,自觉将史科学的方法引入经学研究之中。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高度评价的:“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4]这种“以史证经”的方法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学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传统注疏往往容易陷入主观臆断或空谈心性的窠臼,而杨树达先生深受清代朴学“无征不信”的影响,将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与《论语》相关的资料,依原文次第疏列。这种带有类书汇编性质的资料排比,做到了“证据充分,事理俱在”,真正践行了“我注六经”的客观立场。

钱穆先生以史学家的宏大视野,将“心学”与“史学”两个维度引入《论语》的解读中:一方面以“心学”阐释“仁”之朴素情感,另一方面以“史学”剖析“礼”之内核,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孔子思想的历史原貌。同时,他秉持“直明本义”的治学宗旨,在广泛考辨皇侃、朱熹等前人注疏的基础上,折衷求是,为《论语》字句赋予了清晰明净的现代意涵。尽管其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部分解读上带有主观维护的色彩,但这并未掩盖其在文献考辨与义理阐发上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近代《论语》注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著作。

(二) 文化传承价值

《论语疏证》鲜明的时代特色——即运用近代史科学与科学考证方法——使其成为那个时代文化转型的杰出代表。杨树达先生在疏解过程中,既保留了传统学者对经典的敬畏与温情,又注入了现代学者的理性与审慎。这种“慎重的创新派”立场,使得《论语疏证》在整理和传承先秦儒家思想时,能够廓清历代附会与误读,为把握孔子学说的历史语境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它不仅是对《论语》文本的抢救性梳理,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系统性激活。这种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全盘否定,而是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去伪存真的文化传承精神,具有持久的学术示范意义。

《论语新解》不仅是一部经典注本,更是钱穆先生为传统文化接续血脉、重塑文化认同的精神载体。他深刻洞察到文化、历史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将《论语》的阐释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紧密相连。他致力于挖掘《论语》中的文学艺术美与核心思想,旨在引导现代读者重新认识先秦时代的孔子,从而深化读者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为中华文化的赓续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动力。

(三) 对后世《论语》研究的启示

《论语疏证》启示后世学者,经典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文献与史料基础之上。杨树达先生“著作等身,几乎均成为经典”的功力,正是源于其严谨而有方的治学态度。同时,《论语疏证》证明了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学术观点是难以辩驳且不会过时的。尽管时代变迁,但《论语疏证》所确立的“以经证经、以史证经”^[4]的互证逻辑,以及其“间下己意”的审慎考辨精神,至今仍是《论语》研究乃至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参照。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以其独创的方法论、客观的史科学路径和深厚的朴学底蕴,在《论语》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代表了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成就,也为如何在新时代科学地研究、传承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学术示范与方法论指引。

钱穆先生贵求融通一体的治学态度,启示后世学者在研究经典时应跳出狭隘的学术壁垒,将文本置于广阔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立体考察。同时,他在注解中流露出的文化情怀与主观偏袒,也为当代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契机:在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研究者既需要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文化认同

感,又需要保持对过度主观维护的警觉,力求在历史考证与义理阐发之间维持客观理性的平衡。唯有如此,方能推动《论语》研究在当代语境下实现更为科学与公允的发展。

7. 结论

综上所述,杨树达的《论语疏证》与钱穆的《论语新解》虽同为近现代《论语》诠释的里程碑式著作,但二者在学术理路与价值取向上呈现出鲜明的互补性。

杨树达以语言文字学家的深厚功力,将乾嘉朴学与近代史科学相结合,确立了“以史证经”的严密体系,重在“求真”;钱穆则以史学家的宏阔视野与文化守护者的使命感,践行对经典内在价值的肯认,主张“直明本义”与“折衷求是”,重在“求用”。从更深层次看,两部注本的差异实则是“汉学”与“宋学”在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不同回响:杨树达以科学方法继承并发展了汉学的考据传统,钱穆则秉持着对文化遗产的关切接续了宋学的义理精神。

两部注本的差异提示我们:经典诠释始终面临着“历史还原”与“意义创生”之间的张力。然而,二人的学术路径并非截然对立。杨树达在客观考证中隐含着对孔子思想的认同与守护,钱穆在义理阐发中亦未脱离对文献的审慎考辨。二者各自在“证”与“解”之间寻求平衡,共同构成了近现代《论语》研究的完整光谱。如何在科学考证与义理阐发之间保持健康的张力,正是这两部注本留给当代学人的永恒课题。

参考文献

- [1] 赵兵兵. 杨树达《论语疏证》成书与出版考述[J].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17(1): 118-130.
- [2] 杨树达. 论语疏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3]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4] 黄云. 康有为《论语注》与杨树达《论语疏证》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6.
- [5] 徐超. 杨树达语源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J]. 文史哲, 1991(4): 103-105.